

周恩来亲自执导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红色记忆

提起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当年参加这部史诗创作和演出的文艺工作者们不约而同说出的第一句话就是：“周总理是《东方红》的总导演！”今天，当我们打开历史画卷，重新审视这部史诗诞生的那段历程时，周恩来的意义，是远非一般纯粹艺术上的“总导演”这个职衔所能容纳得了的。

1964年7月，周恩来受陈毅邀请前来上海，观赏第五届“上海之春”开幕式演出过的音乐舞蹈史诗《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面对亲身经历过的一幕幕激动人心的场面，周恩来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就在观看演出时，周恩来的心中酝酿着一个更大的创作设想，在国庆15周年之际，排演一部大型的歌、舞、诗结合的史诗性作品，来完整地、艺术地反映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

周恩来一回到北京，马上找来周扬及文化部、总政文化部有关负责人谈了他的设想。接着他又在国务院各部党组书记会议上透露了他的设想。有人建议用“东方

红”为名，周恩来眉头一挑，露出了赞赏的笑容，说：“《东方红》这个题目好，既精练又切题。”

周恩来一向办事有头有尾、认真负责，既然他的决心已定，那么接下来便是事无巨细，亲临现场，一一落实。

第二天，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国务院外办、对外文委和文化部负责人研究“北京音乐节”问题时，又借机将他搞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的想法在外事、文化圈内吹了“风”。大家一听很振奋，但是一指头，又有点胆怯，毕竟这个创作任务是跨越共产党40多年历史长河的宏篇巨作，舞台上的表演虽然只有两三个小时，而幕后的工作量却不是三朝两夕能完成的。

周恩来见大家沉默不说话，便爽朗一笑对大家说：“时间虽然紧了，但有上海的大歌舞，总政文工团有革命歌曲大联唱，还有飞夺泸定桥等表现革命历史题材的舞蹈，以这些为基础进行加工，是有可能搞出来的，就看大家有没有这个决心了！”

有周总理亲自打气撑腰，大家的积极性很快调动了起来。7月30日，周恩来在西花厅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最后拍板定夺，决定大歌舞立即上马。会上，他亲自点将，拟定了一个由13人组成的领导小组名单和组织指挥工作小组名单。

在周恩来的策划下，这部反映苦难深

重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奋起抗争，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人民共和国的宏伟诗篇终于启动。不久，上海12位参加大歌舞的同志奉命进京，参加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排演。

周恩来的这一策划，固然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但也包含了他的一些良苦用心，即他想通过这个题材给一些优秀的艺术家、文艺家加上一层保护色。

在《东方红》的创作与排演中，周恩来是名副其实的总导演。从作品主题的确立到艺术表现手法和原则的把握，乃至许多细节的处理、道具的使用、服装颜色的选择等，周恩来无不亲自过问。关于《东方红》要表现的主题，周恩来对创作人员说，毛主席总结我党的历史经验时指出，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是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因此，《东方红》所要表现内容的选择和情节的安排都应围绕这三个法宝及其相互关系。

为了确定在艺术上如何表现，周恩来和艺术家们一起磋商这个难题，就像科研人员攻关那样，拟定了几个方案。他以自己是一名创作者和观众的感受告诉大家：“中国革命本身就是一部壮丽的史诗，史诗要用史诗的写法，一定要注意艺术风格、艺术手法的多样化，要很深刻，又能打动人，平板、单调、贫乏的东西不仅不能使人受到教育，也不能使人得到艺术享受。”

为了使《东方红》达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周恩来一方面亲自请熟悉党史的中央、军队方面有关专家给编制人员作报告；另一方面，在创作中一一进行具体指导和纠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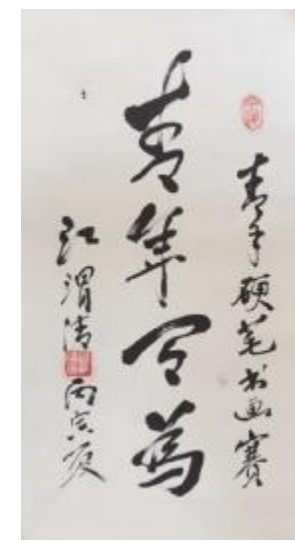
可以这样说，《东方红》的每一场、每一个细节，从歌词、歌曲、乐曲、朗诵词以及服装道具舞美等表演艺术手段的设计，都渗透着周恩来的心血。每一次分场排演，他都亲自审看。正式公演前预演过8遍，周恩来竟然反复地看了5遍。每次演出后，周恩来都亲自主持座谈会，征求意见。当时许多参加《东方红》创作和演出的作家、艺术家和演员们，都对周总理对艺术规律的深刻把握和他的民主作风敬佩不已。

1964年10月2日，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终于第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演出，共演出了14场，场面之大，演员之多，气势之恢宏，轰动了整个北京城，辛勤的汗水终于赢得了热烈的掌声。这是文艺界空前的盛况，《东方红》不仅在国内引起轰动，而且还受到前来参加国庆15周年观礼的许多外国友人的盛赞。

但是在作总结报告时，周恩来丝毫没有将《东方红》的功绩归于自己，而是强调这台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的成功归功于毛泽东思想，归功于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共同努力。



【名人与射阳】



1986年夏，江苏省委原书记江渭清为射阳举办的青年硬笔书法赛题字：“青年有为”。图为江渭清书法影印件。王中印 摄

文坛名家

余秋雨： 真正的诗意在老年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余秋雨写作出版了包括《艺术创造工程》、《戏剧理论史稿》在内的一系列学术著作。这些著作作为余秋雨在学术圈赢得了声名，也帮他开启了仕途，他先后出任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院长。

仕途一片光明的时候，他的生活却在谷底挣扎。当时他住在上海龙华一个简陋的两居室，每逢下雨，家里就漏雨，身体也不好，常常生病，情绪总是低落。比起病痛，更焦灼的也许是精神的撕裂感。就在那段不甚自由的苦闷时间里，余秋雨完成了《文化苦旅》的大部分写作。在时任上海知识出版社常务副总编辑的王国伟之前，余秋雨曾把原稿寄给多个出版社，但杳无音讯。最终，王国伟说服了总编辑，不但出版了精装本，新书首发仪式还定在了当时上海最大的新华书店。市场反应超乎寻常的热烈，首印的一万册在三个月内售罄。许多名家给了很高的评价。

那是余秋雨如日中天之时，然而好时光短得人叹息。余秋雨参加完香港凤凰卫视的千禧之旅结束没多久，北大中文系学生余杰发表《余秋雨，你为什么不肯悔》一文，声称余秋雨在“文革”中参加过“石一歌”写作组，写过极左文章，称他是“文革余孽”“文化流氓”。之后有人开始调查余秋雨到底在“文革”中做了什么，有人批判余秋雨的文化考察不过是“文化口红”，有人揭露余秋雨著作中有一百多个文字差错；这种讨论甚至进入了私人领域，余秋雨与马兰三不五时就要“被离婚”一次。

诸多争议，似乎并没有影响余秋雨三个字在图书市场上的号召力。只是，他的新书似乎有些寂寥：依旧畅销，却不再像早期的书那样引起广泛的讨论。

在王国伟看来，《文化苦旅》之后，余秋雨发生了一个写作面向的变化，从精英写作转向了大众写作，“他是为大众阶层写作，不是为学界写作。大众需要煽情，大众很喜欢他的东西，所以他的书每本都能卖得好。那么带来的另外一面，精英就对他是一片批评声。”

现在的余秋雨，对于文字的表达有一种近乎偏执的自信：“这是我比较偏的地方，我跟出版社明确讲了，不能添字，不能减字，一个标点都不能改。”在王国伟记忆里，曾经的余秋雨不是这样的，“那个时候我给他改稿子，有错就改，跟他说什么他都肯的。”

关于毁誉参半的大半人生，他不想总结，也不想给自己下定论。聊到衰老这件事，他说了这样一段话：“老年时代是诗意的时代，真正的诗意是在老年，因为他一切追求都追求过了，一切目标都已经失去了，剩下的就是像诗一般过日子。他拥有长天白云，拥有非常没有实际目的的美好的晚年，他又可以很温和地劝告很多年轻人，能够安静地过日子，这就是诗啊。”（源自《报刊文摘》）

挽留时间

王鼎钧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也不是一天可以拆毁的。小时候，在作文簿上写“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以及“无情的时间像流水逝去”。现在想想，也许并非如此。

时间看似无情，却仍然可以挽留。如果你爱它，它就留恋你。如果用功读书，时间就留在你的成绩里；如果你锻炼身体，时间就留在你的健康里；如果你开明热忱，时间就留在你的人缘里。

“日月如梭”，梭留在织成的锦缎里。“光阴似流水”，水留在工厂的电力、水田的禾苗、游船的行程里。

“杀死时间”的意思是使用时间，“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是打发时间，两者并不相同。中国人常说“消遣”，“遣”也是打发的意思，好像唯恐时间不走了。错了！时间是一个匆忙的过客——只有它抛弃你，不是你驱逐它；只有它忽视你，用不着你敷衍它。你必须有“杀死它”那样的果决和敏捷才能使它为你所有。时间如鱼，怠惰的渔夫，漫不经心的渔夫、自暴自弃的渔夫，总是徒有一张空网。

哲人说：“时间留，我们走。”这句话可以代替所有的励志格言，也可以做一部文明史的总标题。



气势恢宏的盐城红色文化

盐城曾经是一方红色圣地，“陕北有个延安，苏北有个盐城”，这里成为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盐城境内248处革命遗址，目前，修葺一新的新四军纪念馆、新四军重建军部旧址、华中鲁艺艺术学院烈士墓和抗大五分校旧址已经重新对公众开放。

新四军在盐城重建的历史始终是红色文化资源和精神财富。战争年代，新四军与盐城人民鱼水相依，生死与共；抗日民主政权关注民生，造福一方。新四军战士跃马东进的铜像，矗立在市中心广场历久弥新，它昭示了抗战时期新四军在盐城奋战的光辉历史。

1939年底到1940年春，蒋介石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共在江南、华中乃至华北的根据地均面临严峻的局势。中共中央迅速在战略部署上作出重大调整，指示华中各部队放手向包括苏北在内的全华中发展，“不到海边决不停止”。1940年4月，中央军委指示：“我八路军有抽调足够力量南下援助新四军，建立新的伟大抗日根据地之任务”。

1940年6月，陈毅的江南指挥部，遭受国民党军冷欣部的包围，新四军挺进纵队又在江北郭村告急，皖南军部又东移无望，陈毅一时无法在长江两岸同时拒敌，遂决定率先单独遵从中央的方针，率江南新四军主力渡江北上，并毅然发起黄桥战役反击国民党军的围攻。在接到中央援陈毅的命令后，黄克诚即率八路军第五纵队主力从淮海区挥师南下，重击韩德勤后方，直下盐城。

1940年10月10日，黄桥战役胜利后，新四军、八路军两支先头部队在盐城、东台间的白驹镇狮子口会师。新四军在华中实现彻底“联通”的战略得以实现。

两军会合不久，皖南事变发生，蒋介石悍然宣布取消新四军，中共中央迅速指示在“华中八路军新四军总指挥部”的基础上于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1941年1月25日，成立大会在盐城游艺场举行，发表了“新四军将领就职通电”：陈毅为代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委，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华中党校、鲁艺华中分院、抗大五分校、《江淮日报》社、华中银行等机构也在盐城相继建立。从此，新四军在中国共产党的独立领导下，浴火重生，驰骋江淮，转战华中，与八路军南北呼应，成为敌后抗战的中流砥柱。

新四军还一支特别注重文化建设的军队。刘少奇、陈毅在盐城以极大的热情发动并领导的敌后抗战新文化运动，吸引敌占区和大后方的著名文化人和青年知识分子；邹韬奋、贺绿汀、范长江、阿英、吕振羽、薛暮桥、孙冶方、顾准等先后来到盐城，投身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文化人的到来，大批文化组织的建立，开创抗战文化的全新篇章；华中鲁艺是抗战文化的摇篮；苏北文化协会是“新文化运动”的舞台；军、师鲁艺团与苏北文工团，是军地文化宣传的主力；湖海文艺社是统战工作的阵地；陈毅倡导成立的“文化村”是文化人的战斗堡垒。

生动活泼的抗战文学，异彩纷呈的抗战戏剧，激昂嘹亮的抗战音乐，丰富多彩的抗战报刊，如雨后春笋般的欢快成长。正是这些积极、饱满、激昂的文艺作品，配合着新四军的光荣战绩，焕发了人民群众的抗战热情，促进了革命军队的大发展，至抗日战争结束时，华中新四军主力发展到21万人，统有地方武装9.6万人，民兵、人民自卫武装近96万人，奠定了中共军队日后在该地区的受降优势，以及在解放战争中实施战略决战的区位优势。

作家轶事

施耐庵观虎

相传，施耐庵在构思著名长篇小说《水浒传》时，为了能更好地塑造出英雄形象，计划在作品中多处安排打虎场面。可施耐庵从未在山中见过鲜活的老虎，对老虎的习性、动态、捕食以及打斗的情况毫无所知，怎能描绘出老虎的凶猛和英雄打虎的神威呢？于是他就近入深山观察虎，并且广泛与猎户交谈，向猎户取经。施耐庵有了求真务实的精神，所以在《水浒传》中，解珍、解宝猎虎，武松景阳冈打虎，李逵沂岭杀虎，都被他写得入神入化，栩栩如生。（杨洋 整理）

从张衡到“张衡一号”电磁监测试验卫星



时空隧道

张衡，中国东汉时期伟大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发明家、地理学家、文学家，被封为南阳五圣之一，与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并称汉赋四大家。他在天文学方面有《灵宪》、《浑仪图注》等，数学著作有《算罔论》，文学作品以《二京赋》、《归田赋》等为代表。张衡为中国天文学、机械技术、地震学的发展作出杰出的贡献，发明浑天仪、地动仪，是东汉中期浑天说的代表人物之一。被后人誉为“木圣”，由于他的贡献突出，联合国天文学组织将月球背面的一个环形山命名为“张衡环形山”，太阳系中的1802号小行星命名为“张衡星”。

2018年2月2日15时51分，以“张衡”命名的电磁监测试验卫星“张衡一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标志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拥有在轨运行高精度地球物理场探测卫星的国家之一。

张衡一号电磁监测试验卫星是我国全新研制的国家民用航天科研试验卫星，也是我国地球物理场探测卫星计划的首发星。该星利用覆盖范围广、电磁环境好、动态信息强、无地域限制等优势，开展全球空间电磁场、电离层等离子体、高能粒子沉降等物理现象

的监测，为地震机理研究、空间环境监测和地球系统科学研究提供新的技术手段。同时，该星探测数据也能成为空间物理和地球物理研究提供重要数据支持。

为什么要以“张衡”命名？中国处于两大地震带之间，自古以来就对地震研究十分重视。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东汉时期伟大的科学家张衡在公元132年发明的候风地动仪。这是世界上第一架地动仪，奠定了中国地震科学的发展。正因为如此，中国首颗电磁监测试验卫星被命名为“张衡一号”。

“张衡一号”命名电磁监测试验卫星，主要是为纪念张衡在地震观测方面的杰出贡献，传承张衡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科学家群体崇尚科学、追求真理的精神内核。

“张衡一号”创造了中国卫星研制领域的多项首次，总体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部分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该星在国内首次实现低地轨道卫星高精度电磁洁净度控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弥补了中国天基科学探测领域发展的一大短板，对后续空间探测任务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国内首次实现轨道精确磁探测，卫星搭载高精度磁强计、感应式磁力仪载荷，有望使中国第一次获取十分宝贵的全球地磁场数据。此外，该星还在国内首次实现高精度电离层电子、离子原位探测。（杨洋）

艺坛快讯

广电总局发文：严格评估偶像养成和才艺选秀节目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近日发布《关于做好暑期网络视听节目播出工作的通知》。

《通知》要求，各省级广电行政部门要指导辖区内视听网站做好暑期节目安排和引导，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青少年追求真善美、传播先进科学知识、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优秀节目放在显著位置，吸引广大青少年通过观看思想性、教育性、科学性、趣味性相统一的网络视听节目有所学、有所乐、有所获。

《通知》强调，各省级广电行政部门要督促各视听

网站暑期进一步严把节目导向关、内容关，持续监测清理低俗有害节目，严防不良内容侵害青少年身心健康；对于偶像养成类节目，社会广泛参与选拔的歌唱才艺选秀类节目，要组织专家从主题立意、价值导向、思想内涵、环节设置等方面进行严格评估，确保节目导向正确、内容健康向上方可播出，坚决遏止节目过度娱乐化和宣扬拜金享乐、急功近利等错误倾向，努力共同营造暑期健康清朗的网络视听环境。（源自人民网）

第十四届中国国际合唱节开幕在即

由文化和旅游部对外文化联络局、国际合唱联盟、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和中国合唱协会共同主办的第十四届中国国际合唱节暨国际合唱联盟合唱教育大会将于7月19日至25日在北京举办。报名参加本届合唱节的共有来自59个国家和地区的合唱组织负责人、专家学者以及308支合唱团的15000余合唱爱好者，合唱节国际性进一步增强，规模创历届之最。

创办于1992年的中国国际合唱节，是我国唯一的国家级、国际性合唱类艺术活动。作为中国乃至亚

洲举办的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国际合唱艺术盛会，中国国际合唱节每两年举办一届，至今已成功举办十三届。

据了解，第十四届中国国际合唱节举办期间，将开展15个大项总计263场丰富多彩的合唱活动，包括开幕式、合唱教育大会、大师班工作坊、评测展演、高水平合唱团展演、合唱新作品音乐会、公益专场音乐会等。其中，本届合唱节开幕式将于7月19日晚在五棵松体育馆举行。（源自中国文化网）